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659-07

课内课外话北美汉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单国钺教授访谈录

李会玲

2009 年至 2010 学年,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简称 UBC)亚洲研究系访学期间,旁听了 Leo. K. Shin 教授主讲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门是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古代研究的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Classical Chinese Studies),亲身经历了北美汉学课堂上规范的学术训练与系统的学术引导。学期结束之际,我们安排了一次访谈,就他的学术经历、北美的汉学状况、学术交流以及汉学课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从中可以了解一代汉学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中外汉学交流的契合点。Leo. K. Shin 教授的中文名字叫单国钺,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获博士学位,现为 UBC 历史系和亚洲研究系的联合教授。

一、学术经历

李会玲(笔者,以下简称李):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这次访谈,让我有机会能够单独与您聊一聊。首先,作为 UBC 历史系和亚洲研究系的联合教授,我对您的学术经历及学术背景非常感兴趣,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生涯?

单国钺(Leo. K. Shin 教授的中文名字,以下简称单教授)我本科一开始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化学。在美国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自己的专业,但你也可以修其他的课,给你很多的可能性。二年级的时候,我去亚洲研究系上一门中国历史的课,老师是 Frederick Mote,他的中国名字是牟复礼,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师,是比较老派的学者,总是很正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时候。那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没有电脑,没有 PPT,他所有的教具就是他的笔记本和墙上的地图,每天上课的时候只是谈话,但是讲得非常好。可以说是他带我学中国历史的。1988 年,余英时老师从耶鲁大学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我也修他的课,他还让我听他的研究生的课。我还选修另外一个老师 Willard Peterson 的课,他是研究明清思想史的,最后我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本科的毕业论文的。

修课和写论文的过程都让我希望能够继续去读研究院,可是我也不想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毕业之后就回香港当了一年的记者,然后又回到普大读硕士。在美国比较大规模的研究院,硕士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学位,在普林斯顿、哈佛、哥伦比亚,他们收学生主要是收你来做博士生,中间的时期你还是要用两年的时间来修硕士课程和预备综合性考试。通过考试后,会授予你硕士学位,再看看你的表现怎么样,能写论文的话,就可以收你做博士生。其实在普大,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收自己的学生,可是我是从化学系毕业的,不能算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这样做,是希望你能在外面跑一跑。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我也跟我的学生讲,你要是在 UBC 拿学士、拿硕士后,是很应该到外面去读你的博士的。当时我申请了哈佛和普大,两边都有机会,可是还是觉得普大最适合我。哈佛, Peter Bol 在那里,

Peter Bol 是做宋代思想史的,但主要还是想跟余老师。

李:您在您的教学网页上表达了您的教学理念,其中谈到:“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像我最好的老师们一样去鼓励学生想象,并帮助他们发现学术兴奋点。”请问,在您的求学生涯中您觉得最好的老师有哪些,他们对您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单教授:我的老师主要是在普大,80年代普大可以说是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有牟老师, Peterson 老师, Peterson 现在是《中国剑桥史·清代史》第九卷的编辑, Twitichett 老师, Denis Twitichett, 他的中国名字是崔维德,他很有名,也是《中国剑桥史》的合编者之一。我本科时没有修 Twitichett 老师的课,他是在80年代后到普大的,从英国剑桥过来,以前是那里的讲座教授。牟老师退休以后就是余英时老师,还有一个刘子健老师。刘老师是做宋史的,很遗憾我没有跟他修课,他是宋史方面第一流的学者。那时普大很强,崔老师是唐代的专家,刘老师是宋代的专家,牟老师是明代的专家, Peterson 老师是做明清史的,主要研究思想史,所以普林斯顿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老师, Susan Naquin, 韩书瑞老师,她主要做清代宗教史研究,她是我比较晚一点的老师,她90年代中期才到普林斯顿,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之一。这些都是我在普大的老师,他们的风格也都很不同,每一个老师都有影响。

牟老师90年代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每年都会回来,跟我们谈话。牟老师跟崔老师是比较老派的学者,他们很亲切,但是也有绅士的传统正式的一面,很有趣。二战的时候,在哈佛有一个特别的项目,专门训练语言的人才做军事翻译的工作。赵元任当时在哈佛负责这个特别的语言项目,有中文的,有日文的。牟老师是其中的一个学生,还有好几个以后在东亚研究方面有影响的人都在这里学习过。牟老师在那里毕业,1945年被派到中国去,一段时间在云南,没有什么危险,正要被派去危险的地方时,战争已经结束了。1945年他在中国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美国,几个月后又回到南京读书,其实他的本科是在金陵大学读的,他是1948年的毕业生。牟老师的普通话讲得比我好,如果不见他的面,只听他讲话,你不知道他是一个白人。崔老师在英国也当过兵,他研究中国是经过日本的学者,从日本老师那里学习中国历史,他的日语比中文好一些,他看中文当然没有问题,但他不能讲。Peterson 老师是后一辈,是崔老师的学生,他现在还在工作,还没退休,70多岁吧。他是一个很细的学者,他著作不多,可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看你的论证,看你用的材料,他可以听你讲一个小时,然后问你一个很细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往往是最关键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整篇文章就不能成立。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可是他自己写得不多。

Susan Naquin 比起别的老师来比较实际一些,她看你的论文,可以知道其他读者看你的论文时会提出什么问题,她能够从比较广的角度来看你的研究。她对中国的研究可能没有其他老师那么深,但是能够从比较广的角度看问题。

余英时老师很可爱,他有很多学生,他有一个烟斗,真的抽的时候不多,讲课的时候,他会把烟斗点起来,但不抽,讲半个多小时,看到烟斗熄了,再点一次。他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师,很关心学生,但他不是一个很细的人,他看到你的论文大方向是对的话,就不会问你一些很细的问题,他会让你自己来。他对他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讲,理论是重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材料,材料是根基,先材料后理论。那时候理论有很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很流行。他说,你可以用任何漂亮的语言,说漂亮的理论,可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你的材料要扎实,你的研究要扎实,在扎实的材料上盖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风格。那时我很幸运,有这么多好的老师,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美国主要的大学里的老师差不多都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学生,或是第二辈,或是第三辈。

李:您谈到余老师要求你们要有扎实的根基与材料,听您的课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在西方的语言环境与学术背景下,老师怎样对学生进行中国学问的学术训练与指导呢?

单教授: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方法与项目。在西方或者在北美,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希望

学生可以做到的是要有很扎实的根基,最起码对你的本行的研究工具要很熟。当然余老师不会期望我们把四书五经都背起来。根据你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你研究古代史,先秦的,你要对先秦的工具书,一些主要的文献,要有一定的理解。不用背起来,可是你对版本学,对研究的工具,要熟悉。你要是做宋、元、明史的话,你要对那个时期的材料很熟。当然牟老师、余老师们还是希望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传统要认识,但他们知道现在的学生不可能,最基本的是要对你的本行的材料有足够的认识。

还有在北美读书,看你在哪一个系,如果你在历史系的话,你除了对中国有认识以外,你对西方历史、西方的理论也要有基本的了解,让你在课堂上或在研讨会上可以跟研究欧洲史或其它历史的人有办法交流。其实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高,也不是要你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传统很熟,但你对自己的本行要熟,对西方的学术要有一个了解,对日本的学术也是要有了解。在北美,在普大,还要求做中国研究的学生念日语,这样可以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有一些交流。

在北美接受训练的学生,其中一个主要的出路是在北美教书。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哈佛,他们有可能是到一个比较小的学校。小的学校可能会要求你做不同的事情,有可能教中国历史,有时也会让你教日本历史、韩国历史、世界历史。如果做文学研究的话,整个中国文学你都要教,从古代到现代,当然有些学校有两个老师,可以有点分工,一个教古代,一个教现代。但是很多学校只有一个人,从语言到文学,都是一个人。所以训练的一部分是,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能适应下来。

李:您在2006年出版了您的专著《种族和中国明朝的版图扩张》,而余英时老师有一本书叫《汉代的贸易与帝国扩张》,您的这一研究是不是与余先生的学术传承有关?

单教授:我们现在看余老师的学术,其实很少人会提到他的第一本书,他比较出名的还是后期的作品,主要是思想史的研究。最近他的这个第一本英文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想介绍一些新的考古材料;另外,在60年代,中国的对外政治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他的这部作品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写出来的。一方面是介绍新的考古材料,另一方面是从基本的中国材料里面讲一讲中国的对外关系。

我的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本书跟他的出发点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直接的影响没有。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种族,或者民族、民族性,是当时西方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从60年代开始,社会史抬头,研究不同的社会阶层,不是从大历史出发,不是从政治史出发,不是从军事史出发,而是从性别、阶层、民族里面谈历史,是从下面看历史而不是从上面看历史。当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对性别、阶层、民族都有很多研究,种族或民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中国,1949年后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讲法“中华民族”,不同的源头,不同的民族,经过历史,融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这是1949年后国内学术界的共识。20年代早期的一些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民国时期以及现代的国史,他们的整个故事都是在讲现在的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经过很多的战争、外族侵略或者阶级斗争,最后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对国内大部分的读者、人民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故事。其实其它国家也一样,美国、加拿大,不管什么国家,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都一样,最主要的故事就是自己的国家是怎样成立的。这是很重要的故事,可是如果你允许自己不一定要去讲这个故事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会问,每一个时代,民族是什么意思,“中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从一个新角度,立足于材料来看中国历史上人群是怎样被分类的,统治者是怎样了解自己的人民和版图的,是我这本书的出发点。从明代的士大夫或者君主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用“中华民族”这个词,也没有用“民族”这个词将明代版图里的人分开,他们对血统不看重,他们比较重视的是你是不是赋税,是不是在直接的统治下,是不是被同化了。

李: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目前的研究工作和史学思想?

单教授:我现在在做岳飞研究,研究从宋代到现代岳飞形象的转变。从宋、元开始,戏曲里面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岳飞戏。在明中叶,“土木之变”之后,汤阴、杭州的岳飞庙被重新建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明中叶以后岳飞被重新提出来?在清代,乾隆皇帝对岳飞非常感兴趣,你如果去汤阴的岳飞庙

可以看到乾隆写的碑文,把他捧得很高。乾隆对岳飞有这么高的评价,后面有一个政治的背景。另外,在 2002 年中国有一个小的争论,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提法是:岳飞不能算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打的是女真,而女真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是一个英雄,可是不是民族英雄。这个提法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个强烈的反响,在多伦多、新加坡的报纸也谈到这个问题。岳飞是不是一个民族英雄,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趣的是,现代我们依旧对岳飞的定位有争论。

从宋代到现代,岳飞在政治上,社会上,还有在戏剧里,形象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岳飞的形象是怎样被利用和转变的。不单单是岳飞,我其实也可以选择关公、文天祥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题材。我的一个出发点是历史是每一代、每一辈的人都会去重新了解、重构的历史。当然不会去随便想象、构筑,他们是基于一些材料,可是这些材料该怎样去了解,怎样去分析,怎样把它们融会起来,每一代、每一辈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我是用岳飞这个例子,来看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层次——士大夫或民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理解,希望从这个例子来观察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群是怎样了解中国历史的。

二、北美汉学

李:刚才您提到一点点,美国汉学是在太平洋事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是,现在这个出发点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北美汉学研究的立足点是什么?

单教授:二战的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美国是怎样失去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变“红”,变成共产国家?在 40 年代后期、50 年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哈佛的费正清那时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他的兴趣就是中美关系。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个传统,从 16 世纪的耶稣会进入中国,欧洲有一个研究中国的传统,就是研究中国的古典,他们从“文”的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中国。这个欧洲传统训练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在北美也找到工作。所以 50 年代在北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政治现实来推动中国研究,另一个是欧洲的传教士文科研究传统。

现在二战已经很远了,冷战也过去了,但是北美的传统,或者是基本倾向还在,就是比较重视现代研究,这是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代的题目是怎样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中国处理关系,这是一个在北美进行中国研究的推动力。从我们 UBC 的亚洲研究中心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一个出发点是政策,怎样去协助加拿大政府或者是整个西方体系,去制定一些与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交流、联系的政策,政策研究是他们比较有兴趣的。

最近三四十年,还是比较重视现代研究,古代研究的比例比较小一点。在北美有一个“亚洲研究学会”,每年都在北美的某一个地方开会,2009 年 3 月底在费城,2011 年会在夏威夷,时间三四天,每次大概有 200 到 300 人参加。包括整个亚洲研究,有古代,有现代,有文学,有历史,包罗万象。这个学会已经有差不多 50 年的历史。从每一年会议的安排,你会看到,现在北美的中国研究,不是现代研究,就是远古研究,中间一段,从秦汉以后到清代,其实比较少人有兴趣。

李:在北美进行中国远古研究的立足点又是什么呢?

单教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仅是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西方学者对中国远古研究有兴趣,很多是站在全球史、人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是一个出发点。中国有很多考古材料,和新的出土文献,这又成为中国远古研究的一个推动力。就好像民国时期王国维、顾颉刚这批“古史辨”的学者,他们对文献上的古代历史不相信,而要从考古里面出发,来重新认识中国远古历史的源头。宾州大学的 Victor Mair 教授,写了很多本书,他最有兴趣的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远古交流,他认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与外面的世界就有交流,中国远古的文化发展,可能有西方的影响,同样的,西方的发展可能也有中国的影响,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中国。Slingerland 教授(UBC 亚洲研究系的另一位教授,重点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可能代表另一个方向,他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出发点是认为中国哲学不

是只可以用中国历史来理解的思想传统;中国的思想、哲学是可以从一个世界性的比较角度来看的。他对中国当然有兴趣,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中国,他的重点是从人本、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国。

为什么西方人会对中国有兴趣?很多时候,他们是从中国的材料来了解整个人类史的发展,不一定是对中国有很多情感,不像我的那些早一辈的老师,他们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真的有感情,不光是为了学术。现在比较年青一辈的西方学者,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国际研究项目,可是可能没有多少的情感在里面。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有很多例外。

李:从表面上我们可以将在海外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简单地划分为两类:华裔的汉学家与非华裔的汉学家,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分别。我想问的是:华裔汉学家与非华裔汉学家在进行中国研究时他们的视角、情感、价值取向是否有差异?

单教授:这个很难说。首先,华裔与非华裔其实很难分。如果回到六七十年代,这个可以分得很清楚。有早一辈的老师,在大陆或台湾等华语地区出生,他们来到北美读研究院,然后留下来教书,这是那一辈。可是那一辈的学者大部分退休了,余老师也退了。我想,那一辈的华裔学者越来越少。现在比较年青一辈的,像我们这一辈,也不是太多,从中、港、台出生、成长,然后来到北美读博士,有,可是也不是太多,当然也可以分得清楚,说我们是华裔。现在还有新的一辈,他们在北美出生,他们的父母辈或是祖父辈从国内来到北美,他们看起来当然是华裔,可是他们在北美出生。拿他们跟从中、港、台来的,还有非华裔的西方学者相比较,你可以看到至少有三类。我觉得华裔与非华裔不是一个好的分法,一个比较好的分法应该从不同的年代来划分,因为不同的时代,他们关心的东西也不同。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越战对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事件。六七十年代的黑人人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引发北美学术界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些战争、运动对中国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整个学术界来说,这些社会运动对人们怎样思考、研究问题有很大的影响,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对社会史感兴趣,进行社会阶层与性别等研究。你可以看到在北美,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研究或者是文化史研究,跟五六十年代的有很大的分别,五六十年代还是从上到下的政治史、即有权力的人的历史研究,80年代则整个改变,人们开始从社会下层来研究历史。《明清时期的社会与文化》那门课,一开始我让学生去看《明清时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是80年代的一本书,这样的书在60年代不可能出现。所以,年代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要看他的语言底子好不好。有些学者的语言底子很好,他们可以用比较多的文献来做研究,有些学者的语言不太好,做的题目就往往比较窄。窄与不窄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有一个局限,他的研究需要依赖别人的翻译和别人提出的题目。语言的功夫可以说是一个分别。还有一个分别是有没有机会到中国去住一段时间,这跟他的语言底子也有关系。我有一些同学,他们的语言很厉害,他们在大陆或台湾住一段日子,然后对当地有实际的体验,不光从报纸、书本认识中国,这些学者的研究可能比较深入一些。

三、学术交流

李: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热切地关注海外的中国研究,各种机构相继成立,各种刊物纷纷出版,海外汉学研究的书籍也大量被翻译过来。国内的学术界好像非常迫切地想要了解境外的汉学家是怎样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的。请问境外的汉学家一般怎样看待目前国内的这股海外汉学热?

单教授:当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欢迎,交流永远是好事情。就我来看,有很多西方的学者知道他们的书要被翻译,他们很开心,很鼓励这种做法,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华人世界有影响。这是一个好事情,一方面西方的学术研究介绍到国内,国内的学者可以了解西方的学者在做什么,他们的方法、研究题目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国内的研究在西方也可以看到,或者是国内的学者可以多一点地到国外来交流。

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困难,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有很

多翻译的工作,西方中国研究的期刊或者是丛书,翻译的工作是很难的,我自己也在编一部这样的书——《西方中国史研究论丛》。其中有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怎样保证翻译的品质。因为我觉得有些西方学者的中文不是太好,他们看材料没有问题,要明白一些东西没问题,但他们的中文没有达到一个水平,可以知道自己的书翻译得正不正确。一句话可以有多种翻译,差一点点,就差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国内的学者中有很多人英文很好,可是英文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语言。有一个例子,classic 这个字,它的一个意思是“经典”,可是它也有 typical 和 common 的意思,即“典型”或“通常”,“经典”是 classic,“通常”也是 classic,可是“经典”和“通常”是很不同的。

不知道将西方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在哪一个环节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品质保证。有机会的话,可以在某一间大学举行一个翻译讲习班的夏令营,把最好的翻译家聚在一起,在强化的翻译讲习班里面训练一些有兴趣做翻译的学者,这些人出来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面培养翻译人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翻译真的应该当作一个专业来做。

翻译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要有学术的背景和两种语言的背景,还要有时间,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时候有一个感觉,西方学术是一回事,如一位学者写了很多书,然后他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他的学术在中国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中文翻译跟英文原文当然有关系,但是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好的做法是,当某些重要的学者,他的书被翻译到某一个程度,有好几本书被翻译出来后,可以请这个学者到国内去做一个研讨会,来讨论这些翻译作得成不成功,至少可以知道这些翻译有没有误解原文的意思。这也是一个品质保证吧。我觉得光做翻译,光做出版,还是不行,问题还是很大。

李:目前的汉学交流,就您刚才所谈到情况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时候是海外汉学向国内介绍、翻译,国内的学者向西方学习。您觉得国内的学术界有没有值得海外汉学界学习的地方?

单教授:有,但是现在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在北美有一个很有名的学刊 Modern China,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大部分是历史的,也有文学和其它方面的。编辑是黄宗智,他以前在加州洛杉矶大学教书,现在已经退了,他希望能够把中国学者的研究介绍到西方学术界。这是一本很出名的学刊,最近五年它的很多文章是中国学者用英文写的,一些是中国学者在北美读研究院时写的,也有一些是把国内教授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另外有三种翻译的期刊,有一本叫 Chinese History in Translation,所有的文章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这三本期刊没有 Modern China 那么有名,可是每一年都把比较重要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我认为这是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期刊,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全部都是书评,这本期刊在夏威夷出版,每年两次,里面也收录一些中文的书评,他们用英文来评中文的书。所以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把中国学者的研究介绍到西方来。

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期刊如《中国研究动态》在西方学界也有流行。当然中国有很多期刊,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看。要想把中国的学术介绍到国外,还是要找一个方法。需要一些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办一本期刊,选择比较重要的,或者把一本已经有的期刊中的文章介绍到西方,把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也好,有一个英文的摘要也好,反正不能让它自然发展;然后找一个方法,譬如每年去“亚洲研究学会”做一个小组研讨会,介绍国内的学术成果。日本有一个例子,他们有一本期刊叫《史学杂志》,每一年五月份的那一号,专门介绍过去一年中关于不同朝代的主要研究成果。它没有翻译成英文,是用日文写的,也有西方的学者把个别的章节翻译成英文。对我来说,《史学杂志》每年的五月号是很重要的,没有时间看别的,就看看这一期,看看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果。所以要找一些方法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四、汉学课堂

李:我旁听您的课,看到您无论是在本科生的课堂上还是在研究生的课堂上,都对学生进行规范的学术训练与系统的学术引导,特别是在本科生的课堂上你就向学生介绍什么是第一手材料,什么是第二手材料,并且提供两种材料供学生课外阅读;还让本科生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研究计划;另有专门的写作坊训练本科生写学术论文。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设计理念,或者您这样对本科生进行学

术训练的出发点是什么?

单教授:出发点是这样的:历史是一门学科,那么这个学科跟社会学、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受到学术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是一门史学课,那么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方法呢?研究历史跟研究人类学有什么不同呢?共通之处是它们都对人类有兴趣,但是它们也有不同,其中一个分别是从问问题来的,历史学问的问题跟社会学、人类学问的问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希望学生知道这个分别:对人类的社会状况有兴趣,这是共同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们是对时间有兴趣,对转变有兴趣。我的出发点是研究历史有它自己特有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方法。另外,他们现在大部分是四年级的学生,很快要毕业了,要写一篇研究论文,我和我的同事希望在他们修这种全年性的课程时来训练他们写研究论文。写论文,是应该用原始材料来写的,修这门课的学生大部分不会中文,要用翻译的材料,我希望他们能够不完全是用二手材料来写。要他们用一手材料来写论文,就要告诉他们怎样读材料,怎样问问题,怎样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所以,出发点是历史有它自己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另一个原因是四年级的学生要写一篇研究论文。写论文要用一手材料,所以要教他们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的分别,要教他们先根据个人的兴趣,看看别人做了什么,写一些书评,然后提出一个研究计划。这些都是方法,为了能够达到目的,让学生写一篇论文,从中能够反映出他们已经知道历史研究是怎么一回事。

修这门课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学生是从中、港、台来,中文不错,可是对历史的批判性不高。每一个文献都有它的背景,谁写下来,为什么会写下来,给谁看,为什么会留下来,对很多学生来说,这些问题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觉得这是材料,是材料就用它,完全不考虑它的背景。他们的需要与那些本地出生的西方学生的需要不同。本地的西方学生,他们的中文不好,可是他们在这里出生,读书,批判性比较高一点。学生程度不同,一门课同时要讲给两批不同的学生听,所以在北美教中国历史是比较复杂的。

李:您刚才谈到怎样使用材料,上课时我注意到,您用的原始材料很有趣,如讲到明清时期寡妇的自杀,用了一个特别的殉情的材料;讲到明清时的民间信仰,用到了《了凡四训》中的《功过格》——袁黄写给他儿子的劝善书。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课堂上较少会有老师将这样的材料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去读它、用它。是不是两地研究历史的角度不一样,才会导致这种差异?

单教授: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到70年代后期出现的从下层来看历史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原因是,我怎样去选择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有什么东西被翻译过来。当然有很多古典已经被翻译过来,我可以用;其它明清的材料,如很多小说、哲学、宗教的文献也已经被翻译过来,我也可以用它,可是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有一个理论性在背后。另外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有什么材料已经被翻译过来。其实我很想让学生看看地方志,地方志是很有趣的东西,可是没有人翻译。所以有些东西是希望做,可是做不到。这个对学生来说尤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他们可能对某一个题目有兴趣,可是没有材料,就做不了。国内的老师不用,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现在北美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以前把一本原始文献翻译成英文,然后写一篇导论,已经算是一个大的功夫,可是现在光翻译他们不算成果,其实是不应该。高水平的翻译,然后做一篇导论,这是一个大贡献。

(责任编辑 何坤翁)